

R
THORN BIRD
索·恩

× 获 × 德 × 国 × 历 × 史 × 学 × 家 × 协 × 会 × 奖

一 兼跨甲类之间的报道 × 二 有关世界差异的统计 × **旧中国的最后繁荣：18 世纪的满清帝国** × 三 18 世纪作为过渡期 × 四 经济基础 × 五 贸易专制 × 六 中国在亚洲大陆腹地与经济协定 × 七 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印度、中国南方以及欧洲对亚洲贸易 × **19 世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阴云下的中国** × 八 中国的衰微与不列颠治世 × 九 鸦片入侵与鸦片战争 × 十 外交与“非正式帝国” × 十一 中国市场的边界 ×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屈从与反抗之间** × 十二 “门户开放”与殖民政策；中国作为列强争夺的对象（1900 年） × 十三 经济大变的诸形式 × 十四 平壤联：“满洲国”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 十五 衰落与过渡：战争、内战与革命胜利（1937 - 1949）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著

强朝晖

译

8 中国从 18 世纪到 1949

与 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 世界社会



19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中国 从18世纪到1949
与 *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世界社会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 /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

书名原文：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
ISBN 978-7-5201-5148-1

I. ①中… II. ①于… ②强…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现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3982号

中国与世界社会 从18世纪到1949

著 者 /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译 者 / 强朝晖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 (010) 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8.25 字 数：495千字

版 次 /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5148-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3-5271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忘 掉 地 平 线





中文版序

本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感谢强朝晖女士的出色翻译，让它在时隔三十年之后又有了略经删减的中文版。遗憾的是，由于笔者多年来已不再将中国历史作为研究重点，因此未能有机会对这本旧作进行修订，并将过去三十年来世界各地出版的众多学术著作，逐一添加到附录的参考书目之中。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信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决定将拙著出版，并希望透过笔者从学术视角对这段历史的观察与书写，能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带来一些启迪。

当我在80年代中期着手写作这本书时，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供我作为参考。在这其中，传统“中国研究”（汉学）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一直较少关注，而更多是将中国的独立与自我封闭式发展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不过，在这种主流趋势之外有一个特例，它就是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创立并领导长达数十年的哈佛学派。这派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武力打开国门及其在方方面面造成的长期影响做出了精彩分析。

费正清学派的视野是辽阔的，但在我看来却仍有拓宽的余地。这些美国学者中，有些人是从政治和军事层面去梳理中国的对外关系，还有些人是从经济学角度将清帝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作为研

究课题，而第三类学者则把目光集中于文化影响和文化输入问题，并将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作为重点。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曾就一个专项课题做过研究，这就是1930年代英国资本在华扮演的角色。当时，中国一度涌现出一股利用外资的潮流，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

当我在1980年代写作本书时，我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更开阔的框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一并纳入进来。因为在我看来，把这些视角区分得过于清楚，是一种人为和刻意的做法。同时，我还为本书增添了另一个视角：当时我正在为筹备中的另一部作品搜集资料，其主题是18世纪（即启蒙时期）欧洲学者对亚洲的看法。这本名为《亚洲的去魔化》的作品于1998年出版，其中文版也已于不久前问世。于是，我就把自己对欧洲对华认知这一问题的兴趣作为引子，写下了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开篇的这一章讲述了欧洲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种种印象，这些印象中当然不乏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基于理性观察得出的，其中有些已经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得到了确认。将这一话题也纳入本书的视野，于我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选择了“世界社会”这个关键词作为本书的书名，这个词后来成为“系统理论”（Systemtheorie）当中的重要概念。不过，在这套理论中，“世界社会”有着另外的含义，因此我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本书中的“世界社会”指的是什么。在这里，它的含义并不是说，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某种全球统一的社会结构，这种情况迄今仍未发生；其所指也不是哲学家的乌托邦式幻想，即未来某一天人类将迎来一个全球一统的世界社会，到那时，民族国家也将不再发挥作用。康有为在1900年后不久发表的《大同书》中，便曾表达过这样的理想。

众所周知，上述理想过去从未实现，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

也很难实现。今天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更多是民族原则的强化。从某些方面看，这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民族主义与一点是矛盾的，这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关乎整个人类的核心政治问题已无法再凭借一国之力得到解决，而必须依靠各国的努力和妥协。我们只须想想气候变化的问题，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世界社会”在本书中的含义是指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个环境是由政治和经济两大支柱构成的。文化虽然也偶有涉及，但相对缺乏系统性，而且论述也不够详细和深入。在书中，我将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交互式关系，其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对这种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政客，中外商人群体（business men）同样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书中，我并不是通过对各种历史事件和插曲的细节描写，使这种交互作用得以呈现，而是将秩序更迭作为大的背景。18世纪时，中华帝国仍然属于大国之列，同时也是其自身代表的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从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渐被拖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秩序之中，并从此失去了自主行动的决定权。但是，即使是在国家实力最弱的年代，中国也从未彻底沦为被动的牺牲品。总是有一些团体和个体，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发起反抗。在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国际秩序不再像过去一样，完全是由列强主导。日本曾企图建立某种类似的秩序，但很快便以失败告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书围绕这一时期展开的叙述也显得格外充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些章节是全书最有意思的部分。

回顾过去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呢？历史教训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今人对过去所做出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比情况，这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三百年里，中国的实力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在众多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著作中，这一问题已反复得到阐述。不过，在

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重新崛起还没有露出明显的迹象，本书对此自然也未能提及。

依我所见，我们应当从更具普遍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力量对比问题，这对今天来说尤其重要。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社会，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两者都是以活跃的形态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很少会遵循同一种规律，并且总是在不同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速度。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今天则相反。

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社会的内在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却未必因此变得更统一。1900年前后，也就是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面对的是列强组成的联合阵线。列强之间虽不乏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对华原则问题上，它们奉行的却是同一种帝国主义政策。如今，中国要和为数众多的外交伙伴打交道，这些伙伴在外交政策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就像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那样。美国、俄国、欧洲、印度、日本等国（地区）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充满了矛盾。它们无法再构成一种统一的“国际秩序”，尽管我们时常会看到各国领导人在G20会议上握手言欢。这一现实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外交空间，这是在本书涉及的年代里中国从不曾有过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必要的，其目的是维护和平，并为地球上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建立这种秩序是大国的义务和责任，而今天的中国正是这些大国中位居前列的一个。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2019年6月30日

绪论 / 001

第一章 概述 / 025

- 一 来自中央之国的报道 / 028
- 二 有关世界差异的统计 / 041

第二章 旧中国的最后繁荣：18世纪的清帝国 / 051

- 三 18世纪作为过渡期 / 052
- 四 经济基础 / 062
- 五 弱势专制 / 084
- 六 中国在亚洲大陆腹地的经略与朝贡协定 / 103
- 七 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印度、中国南方以及欧洲对亚洲贸易 / 125

第三章 19世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阴云下的中国 / 149

- 八 中国的衰落与不列颠治世 / 150
- 九 鸦片入侵与鸦片战争 / 167
- 十 外交与“非正式帝国” / 183
- 十一 中国市场的边界 / 206

第四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屈从与反抗之间 / 243

- 十二 “门户开放”与殖民政策：中国作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1895~1931) / 244

十三 经济入侵的新形式 / 289

十四 平稳期：“满洲国”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 334

十五 衰落与过渡：战争、内战与革命胜利（1937~1949） / 376

附录 / 409

参考文献 / 410

注释 / 426

大事年表 / 551

人名索引 / 586

名词索引 / 591

表目录

- 表1 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 1600~1985年 / 042
- 表2 世界十大城市, 1750~1950年 / 044
- 表3 广州航运发展走势(1719~1833) / 132
- 表4 中国鸦片进口(原产地为印度和土耳其),
1801~1839年 / 168
- 表5 中国主要出口商品比例表, 1867~1930年 / 233
- 表6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按投资国划分), 1902~1936年 / 307
- 表7 四大投资国对华直接投资统计(按行业划分),
1931年 / 309

绪 论

一个讲故事的人若想唤起听众的兴趣，通常要让听众相信这个故事与其自身生活息息相关，并借此引申出某种值得学习的经验教训。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却无法沿用这一便利模式。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够提供的借鉴实在微乎其微乃至为零。今天的无产者与古代的奴隶就像一个欧洲人与一个中国人一样，彼此间几无相通之处。¹

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6年在弗莱堡学术协会发表演讲时说过的一段话。这次演讲的题目是有关古典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问题，当时台下的听众并非学术界专家，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人士。在整场演讲中，提及中国的地方仅此一处。直到数年后，韦伯才开始针对与中华文明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阅读和思考，当然，并不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衰落，而是其作为前现代文明的惯性力问题。²在弗莱堡的报告中，韦伯尝试用一个富有形象感的画面来描绘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用一种符合时代思维的对比，让人们跨越两千年的历史隔膜有所领会。通过这样的对比，一个臆想中的场景——现代无产者与古代奴隶的相遇——变成了一次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会面：一边是欧洲人，另一边是中国人。马克斯想

必可以料到，台下的一些听众立刻就会由此联想到19世纪末的著名中国政治家：李鸿章。就在这一年（1896年）夏天，李鸿章刚刚出访欧洲，并于6月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接见。³这位钦差大臣通过翻译，与多位君主和国家政要举行了会谈。难道说，这些谈话说到底还是鸡同鸭讲？就像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用一句话总结的那样：“一个头戴假发或礼帽的脑袋根本不可能懂得，一个梳着满族长辫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⁴

马克斯·韦伯之所以选择中国人作为欧洲人的比较对象，显然是不乏考虑的。这个参照物不同于另外一些在修辞中常见的比喻，例如“霍屯督人”（Hottentotte）^①——一种世纪之交流行的人种学分类。作为外族的代表，中国人在这里是以精致而非“原始”的形象出现的，其代表的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与这种文化的交往从原则上讲，是可以通过有教养的“文明”方式进行的，譬如说以文字作为媒介。因此，[它与欧洲之间的]陌生感并非“野蛮人”与“文明人”，⁵而是文明人与其他文明人——或曰另一种类型的文明人——之间的陌生感。

在欧洲历史上，与其他古代文明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和中国一样，这些文明也给欧洲人带来了强烈的异类感和陌生感。与它们的交往，总是涉及欧洲的界定（Begrenzung）和排异（Ausgrenzung）问题。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冲突。在今天那些自视“西方”后人的眼中，这种冲突被定义为势不两立的原则、世界观以及截然不同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的对抗。⁶后来，在中世纪和近代史时期，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交流和对抗的关系。⁷空间上的遥远距离，使欧洲与

① 南部非洲的土著族群，自称科伊科伊人，霍屯督人系欧洲白人对这一人群的蔑称。（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另外两大世界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同等水平上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性被预先排除在外。⁸然而在进入海外扩张时代之后，随着世界交往的日趋频繁，在欧洲与中国之间造成隔膜的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

从欧洲视角看，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即古代地中海和西亚早期文明所在地域的一大差别在于，两者之间缺乏一种宗教上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能够使双方在保持自身信仰热情的同时，在信奉先知的一神论之间找到契合点。欧洲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许多神学上的攻击，其程度之激烈恰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在信仰《古兰经》的宗教和信仰《圣经》的宗教之间，存在某种危险的相似性。基督教中的非正统流派总是脱不掉受伊斯兰教启发的异端色彩。⁹

虽然说中国与西方意识之间的“宇宙观鸿沟”¹⁰之深，远远超过了伊斯兰教所在的东方，然而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比地理上较易沟通的印度更亲近，且更易理解。与后者不同的是，在欧洲人的认知中，中国从来没有变成单纯的“精神上的东方”（Orient de l'esprit），¹¹一个令人神迷、与现实世界几无瓜葛的童话世界。印度的距离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印度宗教中神秘晦涩的出世观，它与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¹²另一方面则在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包括其语言梵文在内——早已消亡，它只能借助诗歌的形式，或利用语文学和考古学等科学方法，在想象中被重新建构。与近代人对古代的经验相类似，印度传统文化亦可被看作是一种衰落的传统。¹³中国则相反，在这里，古老东方文化在几乎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得以延续，并为直接观察提供了可能性。对近代欧洲而言，这种文化堪称文明的另一种样本，一种以欧洲自身标准衡量迥然不同的古代文明体系。同时，中国还是一个集多种元素于一身的复合体——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在这方面如此特征

鲜明的除中国外再无二例。这些元素包括安于现世、讲究务实的人生态度，商业化、城市化与流动性皆达到相当高度的社会，活跃于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眼界开阔的文化精英，以及以世袭官僚制为特征、结构复杂的国家政权等。所有这些元素的表现形式，都与欧洲大相径庭。此外，这一切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对游客而言，它们不只是可供瞻仰的文稿、碑刻和古迹，而是可闻可见的活生生的现实。¹⁴

在欧洲人眼中，中国时而是借鉴的榜样，时而是嘲笑的对象，但无论何时，中国都是欧洲的反照：一个高度复杂的文明体，其独有的鲜明特征可以使人们通过对照式观察，对西方的自身特点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欧洲不断引进中国的事物，同时又一再排斥它。从启蒙运动初期对孔子的尊崇，到洛可可时期建筑和艺术上的中国风，再到18、19世纪之交后兴起的异域化文化批评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中国在许多方面都给欧洲带来了丰富的灵感。¹⁵但是，与融合远东元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西方通过对中国另类法则的排斥，来树立自我认同，其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了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西方在谈论中国法则时，往往是采取典型化对比的方式：西方与中国，一边是时间文化，另一边是空间文化；一边是历史进步观，另一边是亘古不变的轮回；一边是对个性自由的倡导，另一边是宗族和礼教的禁锢；一边是自我支配型人格，另一边是受传统与习俗束缚的他人支配型人格；一边是将话语公共性视为权力批判的前提，另一边是将文字书写当作权力统治的工具；一边是城邦与民族国家，另一边是中央集权式帝国；一边是基督教启示论，另一边是儒家非先验性的义务论与道家玄学的矛盾合一。于是，欧洲便成为与人们想象中的中国模式这一全世界独有的模式截然不同的反例。例如，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中国是一个古代文明中的另类，“一套[与欧洲]迥然相异的生存法则